

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的相似性及原因探究

王海洋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明清史料和今人著作记载着明清鲁商与徽商一些内容,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 在探究两大商帮兴起与发展过程中, 发现两大商帮的价值取向存在着相似之处: 都呈现出“崇儒重仕”“贾而儒行”“好儒轻贾”等共同点。同时探究其相似性原因: 都受到浓厚儒家思想、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限制商人政策的放松等方面的影响, 希望对其他商帮价值取向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鲁商; 徽商; 价值取向; 相似性

明清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商业社会繁荣, 各地商人活跃, 形成了各地商人群体。其中, 鲁商和徽商是较出名的两个商人群体, 虽然两大商帮崛起的地域不同, 但是他们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

一、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的相似之处

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在实现谋生获利的基础上, 还有着很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他们依然坚持以封建儒家思想观念作为自己价值取向中的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和道德尺度, 以“儒商”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崇儒重仕”的价值取向深深印染在他们内心深处。

绝大多数鲁商和徽商在经商中贾而儒行, 贾而好儒, 勤勤恳恳, 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以求改变自身形象。事实上, 许多鲁商和徽商大都有过业儒的经历或愿望, 如果不是家境贫困无法继续学业, 那么业儒将仍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不能“业儒”, 是带有深深遗憾的。因而当他们致富后, 普遍期望其子弟“业儒”, 进而能够走上官宦的道路。鲁商和徽商重儒的表现形式多样, 不仅自己重儒, 对其子女以儒学教之, 甚至影响其他人重儒治学。

(一) 儒德为范, 重儒好儒的鲁商

鲁商坚持用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及其子孙。“侯燕怡, 字萼亭, 太学生, 初业儒, 后弃而就贾, 句稽之暇则看四子书, 若有所会。人曰: ‘市肆中安用此?’ 笑而不答。为人仁厚诚笃, 善解纷, 乡里有争讼者, 则出财以平之, 无吝色, 人有急难求济”。这表明弃儒就贾的鲁商侯燕怡在经商过程中, 仍然坚持用儒家思想规范其经商行为, 为人排忧解难, 为人诚笃, 可以说是明清儒商的典范。“萧瑶, 字篠庄, 中前所人……幼业儒, 以家贫去而治生, 仍嗜学不辍, 出入往来, 循循儒者, 少年好为义举, 尤多隐德, 不使人知。明季曾于宁海州设典铺一, ……每训其后人曰: ‘吾少贫, 不得已废学去为商贾, 未尝作一欺罔事。往来南北都会, 谨饬自好, 从未屈膝公庭。尔等一志读书循理, 好自为之, 他日凭藉有基, 当不在此余产之几微也。勉之, 勉之。’”这反映了有的鲁商幼业儒, 后因家贫经营典当业, 常常告诫子孙应该业儒, 学做人, 在鲁商眼里读书重儒是第一位的, 经商是被迫的, 不得已而为之。“贾延龄, 字九, 九岁而孤, 母马氏抚以成立。警才骏发, 每思以文学继家声。授室后食指日繁, 乃弃儒就商。虽改业, 而上承母训, 课子读书, 未尝宽假。……平居肆力学问, 精医卜, 善堪舆, 著有《地理切要》《阳宅知要》若干卷, 藏于家”。可见, 鲁商贾延龄的愿望是以文学显家声, 但是由于成家后贫困故弃儒就商, 继承母训, 教育子孙读书, 非常严格; 同时鲁商自己也带好榜样, 非常好儒, 著书藏于家中。

兴办义学, 学校、书院等也是鲁商重儒的重要表现之一。如“许树德, 字心吾, 少孤, ……弃儒从贾, 家道遂隆隆起。……置义学城西, 延师训乡党子弟, 择其佳者厚恤以成就之”。284 反映出弃儒从贾的鲁商许树德在致富后, 兴义学, 延请儒师培育乡中子弟, 并重点培养优秀者,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商的好儒。

(二) 贾而好儒、重儒求仕的徽商

“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商的主要特色。明清徽商不仅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始终彰显这一特色。如“鲍尚志(歙县人)曾云: 吾有三愿: 一为二代建坊表, 一认引地为配商, 一子孙读书入学能成。”69-70 这反映了徽商鲍尚志的愿望之一是希望子孙读书功成名就, 这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公讳鏐, 字公辅, 严泉其别号也, 姓程氏(休宁人)。……商游吴越……易簑之日, 呼厥子若孙语之曰: ‘吾少业儒有志未就, 弃而为贾, 籍籍有声, 汝曹当明经修行, 以善继述。’”88 “公讳海, 字伯容, (姓许氏, 歙县人)。……去儒即商。……即商游乃心好儒术, 隆师课子, 冀功见当世”。“程文傅, 字仲熙, (明歙县) 东关人。……至扬州, 徙业盐旬。……年八十将卒, ……诫子谦等曰: ‘继志莫如读书, 荣名之来, 听之而已。’”66 以上三则材料反映了徽商对其子孙的要求, 让其子孙把“业儒”定为第一目标, 甚至有些徽商死前告诫子女不要继承其经商的行业, 应该是读书求取功名, 也是徽商价值观重儒轻贾的具体表现。

“青麓(许)公讳太明, 字学甫, 别号青麓居士(明成化正德间歙县人)。……幼而聪慧, 槐公(太明之父)初欲其习举子业, 恐其神体弗胜, 命之以商, 公则顺父志, 带货江湖, 苦辛远涉, 击楫而言, 曰: ‘人在天地间, 不立身扬名, 忠君济世, 以显父母, 即当庸绩商务, 兴废补弊。如厥考既田, 嗣当稼穡; 厥考既构, 嗣当栋隆, 弗可改也。而况我辈, 承先人之固有乎。’”这表明徽商许学甫幼年聪慧, 随父经商, 当时人的价值观, 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业儒, 业儒是扬名, 第二才是经商, 经商是回报社会; 子承父业。徽商汪才生晚年告诫儿子要奋发图强, 全心从儒, “毋效贾竖子为也”。这些反映了徽商自认为商人地位的低下的现象, 告诫儿子应该从儒, 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重儒。目前, 研究徽商的学者们认为: 两淮盐商中的富商之家, 经过一两代后, 其子孙大多不是加入儒林, 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茂盛”, 而是显名于时, 甚至是扬名后世。可见, 徽商在经商前后都以“崇儒重仕”为价值取向, 走的是以求“利”开始, 以求“名”为终结之路。

兴办义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是徽商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方面, 也是徽商重儒的一个重要体现。如徽商汪应庚, 曾捐五百金重修学宫, 并以二千金购置祭田、祭器, 以一万金购置学田。康熙《徽州府志·凡例》云: “新安讲学院较他郡为多”。研究徽州教育的学者通过对徽州方志较为全面的考察, 得出徽州地区共存在书院 93 所。明清时期徽州如此众多书院的经费大部分依靠民间捐输, 而徽商就是最为主要的民间捐输力量。也可以说, 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徽商的贡献, 徽商经商积累的巨额财富推动了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徽州地区继承了“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人员众多, 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了科举故事; “连科三殿撰, 十里四翰

林”“同胞翰林”“一榜九进士”“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科同郡两元”。这些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数是徽商的后代或徽商扶植起来的。

综上所述，鲁商和徽商在价值取向方面都呈现出“重儒求仕”“贾而好儒”“重儒轻贾”的共同点。当然，鲁商和徽商在价值趋向的影响下，还有其他共同点如都在会馆内供奉“文圣人”孔子，都具有不畏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等。

二、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价值取向相似的原因探究

（一）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占据主导地位。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可是，随着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发源于“周公遗风”的鲁商和“东南邹鲁”的徽商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价值观采取了扬弃态度。明清鲁商和徽商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义利观”中的“重义观”，并巧妙和成功地将“诚信经营、缘义取利”等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商业领域，构成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另一方面，又对儒家思想中的“轻利观”，加以改造，摒弃传统与教条，创立新的理念观，认为经商获利是正当之事，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可见，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成功地将“儒”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与“商”的经营实践、合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地继承、发展、改造和创新，并创立了新的“商贾观”“儒贾观”，巧妙地利用了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使社会出现了一大批综合素质较高、善经营、懂管理的“儒商”，推动了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忽视两大商帮们对社会功不可没的贡献，长远来看，对今天乃至后世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宝贵的经验。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传统生存方式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条件下，明清时期的鲁商和徽商做出了新的抉择：踏上从贾之路。如山东虽然在历史上是主要的农业粮食产地，但是明清山东地区，尤其是胶东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土地的增长率，造成了人多田少的生存危机，人民为了谋生，好多人都赴外经商。与此类似，同时期具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府，一府六县是典型的山多地少，人口密集，粮食即使是在丰收年也不能自给，要靠从江西、浙江等外省输入，许多人如不选择赴外经商就无法生存。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逐利之风，并且逐利成为经商的重要目的之一。可见，明清鲁商和徽商最初经商是含有谋生逐利的目的。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鲁商和徽商不需要再以经商而感到耻辱，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强，给予鲁商和徽商比前代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扬弃”地发展儒家传统文化，融入儒家伦理之中，建立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鲁商商业文化和徽商商业文化。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造后的商业文化发展造就了大多数鲁商和徽商。

（三）国家放松对商人的限制

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形势，商业政策的变化对商人影响很大。虽然整个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的政策依旧主要是“重农抑商”政策，但是明清政府“银禁，边禁，海禁”三禁政策的开放，促进了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人队伍的壮大。明中后期商人队伍的壮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成了“商帮”。明清时期众多的商帮大多数是由明朝中后期兴起的沿海商人、内地商人和边地商人中分化组合而成，当时已经成为传统商人群体中的一支劲旅。明中叶以前，鲁商和徽商都是有“商”无“帮”，

处于分散经营状态；随着明中后期徽商崛起和明末鲁商崛起，徽商和鲁商群体力量逐渐壮大，商人地位得到了提高，商业竞争日趋激烈。

明清封建政府对商人限制的放松对鲁商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朝嘉庆以后，朝廷对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开始松弛，特别是后来咸丰兵燹之后，边疆危机加剧，清政府开始认识到东北的边疆危机，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移民到东北进行垦荒、经商。当时的鲁商们及早抓住机遇，积极踊跃到关东贸易。咸丰十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其中，鲁商是众多外出赴东三省经商人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此材料可以看出是政府对商业限制的放松，加快了山东人赴东北经商步伐。

弘治五年，“开中折色”是盐业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银禁开放的标志之一。明清徽商紧紧抓住银禁和边禁政策改革的机遇，充分利用货币白银化政策，成功的由边地商人转为了内地商人和沿海商人、沿江商人，从事各种商品的贸易。清朝时期的关东开放，海禁松弛到开放等政策变化，徽商都利用此机遇展现了自己的商业才华。

总之，明清时期全国商业政策的变化成为明清鲁商和徽商崛起的客观条件和重要契机。而明清鲁商和徽商主观上都能够突破全国“重农抑商”政策，充分抓住政策松弛的缺口，并紧抓“银禁”“海禁”“边禁”政策开放的机遇，脱颖而出，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商业界两支劲旅。鲁商和徽商在经商致富后会大批商业资金用于买田置地、攀附封建权贵，培养子孙考取功名等，维护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秩序，巩固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使其成为明清时期两大封建性商帮的典型代表。

三、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的价值取向都呈现出“重儒求仕”“贾而好儒”“重儒轻贾”的共同点。在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的发展对当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最后形成了现在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齐鲁银行、济宁银行、徽商银行等银行。明清时期鲁商与徽商极其相似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给新时代商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商之道和精神财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践行新时代的商业思想也提供了一些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 [1] 张明富. 明清商人的职业身份认同 [J]. 古代文明, 2021(3): 109.
- [2] 董家魁. 明清徽州家谱传记与徽商社会地位的提高 [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4): 97.
- [3] 唐建兵. 明清徽商与古徽州村落营造 [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99.
- [4] 庞利民. 晋商与徽商(上)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7: 268.

基金项目：2020年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科研项目《项目名称：明清时期徽商文化与鲁商文化比较研究及新时代启示》（项目编号：WJKY-2020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海洋（1983—），男，汉族，山东滕州人，历史学硕士，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史、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徽商等。